

政海秘聞 (四)

從唐繼堯到龍雲

●后希鎧（淡江大學、中國醫藥學院教授）

袁世凱一心想稱帝

在我讀小學之時，民國以來的涉外事件，以有關日本的為最令人憤怒。不管史家如何評斷事實，我們的老師總是說日本欺人太甚，竟趁歐美列強手忙腳亂，急於應付歐戰，無力東顧之時，向我國提出「二十一條約」，逼我國承認……言下不勝憤恨之至；這是雲南起義十年以後的事了。

我們的學校老師都稱二十一條為「二十一條約」，特加一個「約」字，用意何在？不得而知。後來讀史，好像都沒有「約」字，反而覺得不習慣。

現在想來，不管有「約」無「約」，都是欺人太甚。

有人說——假如不是袁世凱想當皇帝，日本就不會提出二十一條。這種說法似乎很容易被人接受，因為日本人支持老袁做皇帝，向老袁索賈，三歲兒童也能了解這個道理。可是，我們的老師祇說日本欺人太甚，不歸罪老袁。

問題是老袁死後，日本人照樣「欺人太甚」

；應當如何解釋呢？可見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略矛頭是指向中國，不論何人當道，日本人都要欺人太甚的——「九一八」就是明顯例子。

袁世凱這樣的人——到了民國時代，還想當皇帝，早被國人否定了；我們要問的是：「假如老袁各賜一件「黃馬褂」給孫中山和梁啟超，又不排除國民黨及進步黨，真正立憲，孫梁二人會不會「合作」倒袁？或者其一接受，其一反對到底？

但不管怎樣假設，歷史上真發生了兩黨「不言合作」之合作。

袁世凱的排除「異己」，具體說來，就是排除國民黨及進步黨的勢力——使這兩「黨」及黨「人」都不能在袁大總統的權力之下生存，在不知不覺中「合作」倒袁。

在事實上鬧分裂的國民黨人，還是執著於共和，不論孫中山派或黃興派，都在努力「再造共和」。進步黨的領導人梁啟超，也在努力倒袁。「雲南起義」就與兩黨有關了。

有時問題應該從反面去看——除了雲南起義那一批人物之外，海內海外，的確是處處「倒袁

」。可以說從日本提出二十一條之後，「倒袁」之聲，便瀰漫在全世界中國人的社會裏，連洋鬼子也說：「若國中無內亂（指倒袁革命），則隨時可以實行（帝制）。此係中國內政，他人不能干涉。」這是朱爾典（英使）跟老袁「密談」的記錄。

大總統（老袁）答朱爾典說：「內亂（倒袁）不能決其無，但不至擴大。余可擔保治安之責（平定革命）。惟對外問題，殊為焦慮，不知東鄰有如何舉動？內地治安（倒袁），可保無虞。至東三省及蒙古，實難預料。該處日人甚多，倘有日人被殺，不論華人為首犯，日人為首犯，日人即可乘此造出機會，此不能不慮者也。」

朱曰：「日本勸告（不要稱帝），或係照例文章，至於乘時取利，似亦難言。」

大總統曰：「大隈伯（日）對我駐日公使言：『關於君主立憲事（老袁稱帝），請袁大總統放心去做，日本甚願幫忙一切』。由此觀之，即於表面上，日本似不再行漁人政策。君主民主，本視民意從違。若仍行共和政體，大總統任滿可以休息養老；若君主政體，責任太重，恐非我力

所能勝。」

朱曰：「推辭之故，非責任太重，或不肯放鬆現在權利。查現在各國，不論君主民主，無有如大總統（指老袁）之權之重且大者。英皇之權無論矣，即德皇、日皇，美國大總統之權，皆不及也。」

大總統曰：「貴公使此論頗合情理，余處現在地位，百分責任，自擔八十分，而各部共擔二十分，按理而論，余應擔二十分，而各部應擔八十分，乃為公允。」

朱曰：「若他人擔如此重任（八十分），眠食俱廢矣！」

大總統曰：「余思自為皇帝，不過若干年，惟與我子孫甚有關係。中國歷史，王子王孫，年深日久，無有不弱之理，是亦可慮。」

朱曰：「兒孫自有兒孫福，何必慮及百年以後之事！若能善立家法，令其多得學問閱歷，則王子亦與，平民子弟亦與；若棄家法學問，則又從何與乎？」

大總統曰：「當日提倡共和者，不知共和為何物；今日主張君主者，亦不知君主為何物。多數人民不過有漢、唐、明、清之專制君主印於其胸中，其或百中有一只知日本之君主，其或百中有一知德國之聯邦，至於特色立憲君主，固未嘗夢列也。」

朱曰：「共和政體，華人未嘗研究，君主政體，或稍知之。當辛亥革命之日，華民醉心共和，以此口號推翻滿清。是時，大總統以君主立憲近於中國人民理想，爾與美使嘉樂恒亦曾主張

君主立憲，即前駐京美使柔克義亦屢言之。南北討論（南北和談）之時，唐紹儀因一時之感動，未察國家萬年之計，主持共和，不可謂非失策矣。」這裏所說的「君主立憲」，是指清廷立憲，並非指袁世凱想做皇帝的立憲；可以說英美使個人都是「保皇黨」的同路人。

從這段「密談」的字裏行間，可以看出朱爾典也不贊成袁氏稱帝；咬這洋鬼子一口，說他是袁大頭的幫兇，似乎與朱氏的「說詞」不符。從這段「密談」的記錄中，也可以看出袁氏稱帝，洋人雖不以爲然；可是老袁「帝迷心竅」，蔑視民意，一意孤行，才會有「中華帝國」胎死腹中的一幕。

總之，袁世凱密謀稱帝，並非「民意」促成；老袁權大心大，才是主因。想封侯封爵的籌安會及受其影響之人，不過是奉命行事而已。日本的「勸進」，也不過是推行「漁人政策」。誰在真心「效命」袁皇帝呢？倒是倒袁成風，真有人身許共和，雖斷頭顱，流碧血，也在所不惜。

袁世凱想做皇帝，不過未合時宜的敗筆，屬於個人的狂想；獨夫之莽撞——搞得眾叛親離，羞憤而亡。在歷史上似乎是一件大事；但在政治思潮上，對後世有多大的影響呢？

雲南起義誰發動的

雲南起義是什麼？就是「倒袁」成功的一次武裝革命行動。因爲「倒袁成功」，便成了民國史上一次重要的戰役，功不可沒。

「功」是人人都樂意享有的——這是人之常

情；所以，爭功之事，史不絕書。祇是「功將罪貶」，便會引起爭議。雲南起義便是一件引起爭議的歷史事件，雖然到了今天，還在貶來貶去；可是，「貶唐揚蔡」的老調，很難搞出新花樣。爭議的重點是什麼呢？

「誰先發動倒袁？」這是時間的先後問題。「誰主動？誰被動？」這是膽識有無的問題。時間的先後，膽識之有無，不是辯論家的黑白講，也不是心理學上的問題，而是史實的有無而已；因爲雲南起義是一件歷史事件，無法因個人的喜怒而改變的。

菲律賓總統柯拉蓉女士，是否在政變槍戰中嚇得「躲在床下」，政客或新聞記者可以黑白講，史實問的是有無其事？柯拉蓉女士可以掀開她的床單給電視記者看：她的龍床之下根本沒有空隙，「躲在床下」之謠，不攻自破。可惜雲南起義的重要關係人，都已物故，再也不能掀起歷史的床單給後死的我們看了，唯一的方法就是認定：史實的先後，膽識的有無。假如「認定」不錯，便可了結此一「公案」。否則，對我們雲南人來說，心情總是七上八下的。

雲南起義，又叫擁護共和，簡稱護國（體）。以現代語來說，便是「雲南發動民主聯軍保衛共和國體」，得到各省的響應，獲得最後勝利。

事實上各省紛紛獨立，響應雲南護國起義，並非「中國民主終於勝利」，而是袁世凱一死，「稱帝」的主體不存在了，這場反對「稱帝」的戰役便告結束；所以，中國並沒有因「袁氏」的

死亡而獲得民主。

然而，當時的知識分子——包括政客，認為推翻袁世凱的「中華帝國」，仍保有「中華民國」，便是一件頭等大事；所以叫做「再造共和」。「雲南起義」便與「武昌起義」在伯仲之間，因而產生了這樣的邏輯：「假如不推翻袁世凱，中華民國便不存在了」——意思是說：「中國之有民主，全靠雲南起義」。雲南起義是誰發動的呢？

梁任公——啓超先生說：是蔡鏜這個中心人物幹的。

我們先讀讀梁先生的大作「雲貴首義」。

「雲貴首義之中心人物蔡將軍鏜者，時方在京師。蔡君十三歲時，即從余就學。當民國二年辭去雲南都督之職，即來京師，與余日夕過從。當籌安會發生之次日，蔡君即訪余於天津，共商大計。余曰：余之責任在言論，故余必須立刻作文，堂堂正正以反對之。君則軍界有大力之人也，宜深自韜晦，勿爲所忌，乃可以密圖匡復。蔡君聽其言，故在京兩月，虛與委蛇，使袁氏無復疑忌；一面密電雲貴兩省軍界，共商大義；又招戴君載來京面商。戴君者（進步黨），當時甫辭貴州巡按之職，後此隨蔡君轉戰四川，前日經黎總統任爲四川省長者也。戴君以去年十月到京，乃與蔡君定策於吾天津之寓廬。後此種種軍事計劃，皆彼時數次會談之結果也。時決議雲南於袁氏下令稱帝後即獨立，貴州則越一月後響應，廣西則越兩月後響應，然後以雲、貴之力下四川，以廣西之力下廣東，約三、四個月後可以會師湖

北，底定中原。此余與蔡、戴兩君在津之成算也。其後因有事故障礙，雖不能盡如前策，然大端則如所預定也。議既定，蔡、戴兩君先後南下。蔡君臨行時托病，謂須往日本療養，夜間自余家易裝以行，戴君則經往香港。余於兩君行後亦潛赴上海。余到上海實十二月十八日也，而蔡、戴兩君亦以十九日到雲南。

「余輩在津原定計劃，欲由雲南潛運軍隊到四川境後，乃始宣佈獨立。二十一日，余在上海得蔡君電謂：二十三日前隊出發，出發二十日然後發表獨立之公文。此正在津原議也。而余當時以別種理由，由南京發一電促其早發。且蔡、戴既到滇，滇局亦不能久持秘密。故二十六日遂揭曉。後此在四川與北軍相持，死傷甚多，未始非由揭曉太速之故也。」（盾鼻集）

爲了避免斷章取義之譏，便將這篇記敘文全文照錄，以窺全豹。假如要我「批解」這篇「報導雲南起義」的記敘文，我就會打若干問號：

一、蔡將軍爲何遲鈍如此？到了籌安會發生的「次日」，才去訪恩師共商大計？搞雲南起義的一幫人早就動手了。

據呂天民（志伊）「雲南舉義實錄」所說：

袁氏詭謀「必至實現，惟時機之遲早難定耳。予決計回滇，企圖進行。乃先函達滇友羅君佩金（蔡公恩人，亦蔡氏入川之參謀長，雲南人）李君曰核，趙君仲等，代達鄙意於開武將軍唐公繼堯，得其允許。並函致居東（日本）友人李君根源、居君正、胡君漢民，略言緩急進退均不成問題，惟視吾人之實力何如耳。予意宜一面造機會，

一面乘機會等語。李、居兩君復函，約予東渡。予以東渡愈犯嫌疑，不如直行回滇便。於是遂挈眷返……」

照呂天民先生的說法，這些「不偉大」的雲南人或亂黨（國民黨）之徒，不是在籌安會之前就進行「大計」了嗎？又在雲南起義之時，傻傻的出了死力；祇落得榜上無名，還受「兩面倒」之謗。這就是說：在籌安會發生之前，全球華人對袁世凱的「皇帝夢」已深知深怨了，就連西洋鬼子也勸袁大總統就幹權傾天下的現職算了，還要替兒孫做夢幹嘛？到了籌安會「次日」才共商大計，是不是遲了一步？事實上「倒袁」的人早就各有組織，三三五五，聚論「國非」。直言之，「倒袁」既成了「風」，採取行動乃遲早之事。梁、蔡、戴三人共商大計，能算「倒袁」的先知嗎？阿門！

二、蔡鏜爲什麼辭去雲南都督之職？跑到北京幹嘛？他的恩師爲什麼教他「虛與委蛇」？美其名曰：「韜晦」。袁世凱的特務佈滿滇中，文官（軍政分立）控制雲南，第五縱隊操縱地方武力之時，難道「滇局」就不該「虛與委蛇」？就不能在策略上「韜晦」？必須像「阿Q先生」一樣，直言不諱的搞「倒袁」嗎？雲南人爲什麼那樣笨？真傻！

三、參加雲南起義的外省人和本省人（雲南人），爲什麼都像機器人一樣？爲什麼都受一個「程式」下的電腦指揮？梁任公便是這場「倒袁」戰爭的搖控者；在這篇記敘文中，不是說雲南獨立後一月，貴州怎麼樣？二月後廣西怎麼樣？然

後雲、貴又怎麼樣？廣西又怎麼樣？三四個月又怎麼樣？真是神機妙算，三國演義中的諸葛孔明，能望任公的項背嗎？真是「今之古人」。

四、假如李烈鈞將軍也有一位恩師，這位受張繼在法國說項，得到法屬越警保護的落難軍人，有了出頭天，雲南起義是不是從蔡鐸一雄變為「二雄」了呢？是不是現實政治使梁任公的筆下「抹殺」了李烈鈞的功勞？造成了一個唐繼堯挨罵？李烈鈞不提？蔡鐸情有獨鍾的局面？所以，就算到了今天，這檔子歷史公案，還在受人運用呢！

越想問題越多，爲了「解一時之悶」，猶記三句歪詩，抄錄在此，用供一笑：

天下文章數吾鄉，
吾鄉文章數舍弟；
舍弟跟我學文章……

現實政治醜陋羅網

論功行賞，好像是一句老生常談的話；也是中國人的「王道哲學」。假如說唐繼堯在雲南起義中，扮演的是丑角，罵罵丑角，應該是理所當然。但是，在一般雲南人的心目中，領導再造共和的人物——蔡鐸及唐繼堯，似乎並無軒輊；讀史之後，便發覺「不肯實話實說的人，都在爲現實政治說謊」。

早在幼年之時，便有「聽老兵說洪楊故事」的機會——像我這樣年紀的人，正是雲南老兵說「援川」，說「光復」，說「護國」，說「護法

」，說「下廣西」的對象。因爲護國打了勝仗，人物又多，空間更廣；連廣東這塊革命策源地，也被護國軍搞下了一塊空間；孫中山先生之「有地立足」，護國軍有無「苦勞」呢？然而，唐繼堯却左右不能逢源，受盡文人政治的窩囊氣，你說是咎由自取？還是「不壓壓老唐，怎麼會顯出咱們的威風」呢？在雲南起義中，唐繼堯真有百非而無一是嗎？還是吹毛求疵——專找老唐的缺點來攻擊唐繼堯？連雲南學校通通關門，把教育經費也挪作護國「軍費」的史實，也得不到論客們的同情——不是雲南「過分」愛國，便是雲南「太傻」。雲南俗語說：「買鞭炮給人放」，雲南人做的是不是傻事呢？「滇票」從一元貶爲一角，誰說不是「護國」所賜？在論「護國之功」的文章裏，有幾篇提到雲南財政之窘困？有幾人知道雲南老百姓吃了通貨膨脹之苦——爲的是再造共和？

渲染蔡鐸出京者說：蔡松坡是「裝瘋」逃出魔窟的。他們當然不說爲了「政爭」，而是爲了「共和」，蔡松坡才在北京街頭「裝瘋」、「抓街上的雞大便吃」。我沒有到過北京，不知當時的北京街頭也像農村的「鄉街子」，滿街放養雞羣，雞糞能够隨手可得嗎？蔡鐸出京傳奇早就就傅民間了。因爲梁任公祇說易裝以行，祇是托病，並未說裝瘋。蔡公的秘書周鍾嶽副院長，也沒有在「蔡鐸稱病出京」記中，提到小鳳仙跟蔡將軍的「過從」——幫助革命。

對蔡鐸出京故事的傳奇誇大，便是對雲南起義的歪曲。這就是說，那些腳踏實地，從事「倒

袁」活動的人和事，便被湮埋了。反過來說，不罵唐繼堯，便顯不出蔡鐸對共和政體的忠烈。因此，雲南起義明明是民國史上的一件全國性大事，却被「論客」論來論去，論成了蔡鐸及唐繼堯的功過之爭。粗看似爲「個人之私」，功在蔡在唐，對國家而言，並不重要；袁世凱稱帝不成，才是關鍵。但從國民黨與進步黨的「惡戰苦鬥」看來，「貶唐」即所以「揚蔡」；而蔡的背後，還有一個影子——那就是他的恩師梁啟超。梁啟超者，在清爲保皇黨要角，在「民」爲袁世凱之支持者——進步黨之大佬也；在袁氏病斃之後，中國政局究屬「誰黨」天下？尚在未知之天。所以，誇大蔡鐸的大功，便可以增加恩師的政治地位。那麼，貶抑唐繼堯的「心惡行劣」，便是「揚蔡」的反面文章；「雲貴首義」爲何不提唐繼堯及李烈鈞呢？

在雲南起義之前，在進行之時，袁世凱倒斃之後，唐繼堯是不是有可議之處呢？唐繼堯是不是「完人」呢？唐繼堯有沒有政見上的敵對者呢？

史實就是最好的答覆：

一、唐繼堯是有可議之處；不但李烈鈞、呂志伊諸氏吃過「派頭」，而且王伯羣早在蔡鐸入滇之前，就跑到昆明談論「活我民國」之事；唐繼堯說：「雲南很窮，財政困難，軍械不足，怎能打垮袁世凱？」一副難色。

癸丑二次革命失敗後，老袁的勢力如日中天，袁大頭不但告訴洋鬼說「治安沒有問題」，稱帝之後誰敢怎樣？事實上搞得國民黨「鬧分裂」，

孫中山之徒轉入「地下」，必須打腳墨手印（指紋）才能加入「革命黨」。以黃興為首的國民黨人，又自成一派，以歐事研究會的招牌活動。在「革命黨」發出的第八號通告（一九一五年三月十日）中，有這樣的句子：「啓者：中日交涉事起，國人不明交涉之真相由夫已氏（暗指袁世凱）賣國而來。乃與二次革命有關係者，借此為舉國一致之美名，有迎機投降者，如何海鳴等之自首者也；有恐夫已氏分誘而急欲自白者，如林虎等之通電國內各報館是也；有恐受借寇復仇之嫌疑而自供二次革命有罪（認革命為罪而不認私逃為罪）急向國人哀告者，如黃興等之通電宣言是也。獨孫先生對於此事默不言……」從這些話中，便可看出當時的袁大頭，是如何的「威加海內」了。連革命黨也起來關照——並未與袁世凱「聯手」。

唐繼堯有多少「本錢」？除了像梁任公所說：「虛與委蛇」，「輜光養晦」之外，要教唐繼堯「打明鼓，唱明歌」（曝光）去公開歡迎天下志士「反袁」，是不是不識時務？苛責古人？唐繼堯一再向「各方神聖」（志士）乞求，要錢、要槍、要人（鄰省響應倒袁），便是三合軍陣，不是好吃的果兒——「命」不是一「革」就倒的；癸丑第二次革命，殷鑑不遠。唐繼堯到底不是一位神人，在要人無人，要錢無錢，要槍無槍的情形下，袁世凱的魔爪已伸入雲南，特務或第五縱隊已在雲南佈下天羅地網之時，唐繼堯的堂弟唐三將軍（繼禹）能够遠赴境外迎接志士，還忍心罵人——排斥共和嗎？

雲南人常常說：「擁護共和」是全國大事；所以，不管你「騾子老表」，一律照單全收，就是這個道理。雲南或唐繼堯並非「倒袁」的「當然主人」。我們說雲南是「一片民主的淨土」，是說我國民民主鬥士，為什麼不去經營雲南？護國軍到了四川，還要教雲南擔任「後勤」，不怪雲南是一個窮省，不說蔡鐸不接濟蔡公？如果不是却反咬一口，痛責唐繼堯不接濟蔡公？如果不是蔡公「自想辦法」，這場反袁稱帝之戰，便不堪置想了——雲南真是罪該萬死嗎？

這是一個觀念問題嗎？不是，是一個「揚蔡貶唐」的可笑邏輯。請問——雲南人準備好黃金萬億兩，讓唐公及蔡公去「倒袁」嗎？蔡公既然是「雲貴首義的中心人物」，「中心」到了四川，「想」的是什麼「後勤辦法」呢？

這不是一個歷史公案，而是現實政治污染了史實。除了聽梁啟超的「聲音」外，那些「不偉大的」如李烈鈞、王伯羣、周鍾嶽、李日垓、呂志伊、羅佩金、黃毓成、趙復祥、鄧太中、楊蔡等等有關之人的聲音，也得聽聽，才不會陷入現實政治的醜陋網羅中。

貶唐繼堯的話，雖然到了我們已是成人，還可以在昆明聽到——那就是雲南人也有人「貶唐」。唐繼堯在從黔督調任滇督之時，人事安排，恩怨頗多；也許是私心引來的怨恨。

有人說蔡公暗藏「手槍」一支，出席五華山反袁會議，唐公因受了袁大頭封爵，不肯倒袁。蔡公把手槍往桌面上一擺，說：「咱們槍是一把，血是一盆；你不倒袁，便同歸於盡。」後來唐

繼堯答應出兵反袁，宣佈雲南獨立。這個故事說得有手有腳——說是蔡公使用的手槍，是從黃敏成家裏帶出的。事實上有沒有這樣的事呢？唐繼堯假如無心倒袁，「願意穿黃馬褂」，自然六親不認——既不會讓梁任公「遙控」，也不會受一支手槍之脅迫。

早在武昌起義，雲南響應；南北和談之前，唐繼堯便受蔡鐸（在滇任革命後的都督）之命，任雲南北伐軍總司令，出滇支援武昌起義。後來南北統一，袁世凱做了大總統（取得法統），唐繼堯也陰錯陽差，做了貴州都督。癸丑二次革命，老袁命滇督蔡鐸，黔督唐繼堯去打重慶的熊克武；但在暗中蔡唐二督却「聯手合作」，出川支援二次革命；表面上還是「服從法統」，也就是梁啟超先生所說的「虛與委蛇，輜光養晦」，「應付」老袁。不意蔡鐸的恩師梁啟超做了袁政府的司法總長，蔡鐸也調離雲南，唐繼堯從貴州調回雲南——便是蔡公倒袁把希望放在雲南的主因。也是唐繼堯「虛與委蛇，輜光養晦」，希望蔡公能够脫險離京，返滇共謀大計的前緣。

所以，蔡唐二人的真真假假，虛虛實實，祇有蔡唐二君自己明白，我們後來之人，替他們作「精神分析」，不是他們有毛病，而是我們多烘於「鄉、黨、資」的自私。站在國家的立場，我們祇能看實際表現出來的是什麼？正如一支革命隊伍中的成員，有的可能是失戀，可能是失業，可能是個人的任何因素，才來參加革命；如果說每一個人都是為了革命而革命，那就偏離事實了；唐繼堯擁護共和，雲南人作了最大的犧牲，這

中 是一個史實。論客偏要曲解「虛與委蛇」爲非，不強調「苦肉計」之苦，那就是「史論家」在作孽，造成了唐繼堯「很難活」的尷尬之局。

反袁之火並未熄滅

袁世凱密謀稱帝，並不「始」於「籌安會的發生」。換言之，在二次革命之前，就有人不滿袁大總統的所行所爲了。二次革命失敗之後，國民黨人雖然被老袁搞得東逃西散，反袁之火，並未熄滅。

我們在上面說：一件「蔡唐李三雄合作」再造共和的全國大事，却被現實政治污染，變成了一件「蔡唐爭功」的下場。在雲南人來說，便是一件啼笑皆非的事。在蔡公的追悼會上，唐繼堯當衆宣佈——如果要說「雲南起義」是誰「首先發動」，應該是「孫先生」。唐繼堯既是同盟會的會員，也是響應武昌起義，光復雲南的一分子。不管怎樣說，唐繼堯總是受過孫先生薰陶的人；所以，譚人鳳記討袁一事說：「……愚見以爲宜遣一使促湘、粵、滇三省獨立，再檄各省與聞罪之師……」可見孫先生之徒，還想到雲南尚有一批「同志」足以「首先聯絡」，可通「獨立」訊息，這是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以前的話。

二次革命失敗，國民黨分裂，孫中山另組革命黨，轉入地下，嚴格紀律，繼續「倒袁」。便有兩個雲南人受命討袁，一位是軍事方面的鄧泰中，一位是秘密活動的呂志伊。鄧泰中暗爲革命黨的雲南司令長官，明爲雲南開武將軍（袁世凱所封）唐繼堯的部下，也就是首先入川激戰北洋

軍的支隊長。呂志伊入滇之後，聯絡楊蔡、黃毓英、羅佩金、趙復祥、劉雲峯、申學如、李曰垓、趙仲、謝樹瓊等，暗中進行倒袁，深得人心。

這些人是不是進步黨人呢？也不會是梁啓超的死士吧？他們多半是蔡公的部屬或實友，參加過雲南光復（響應武昌起義）的同志；他們也多半是「孫先生」的信徒。在孫先生遠避日本，深悔不該寄望袁世凱太甚，另組革命黨，準備真刀真槍大幹一番之時，想到雲南還有一班老同志，派呂志伊去聯絡各方倒袁，並非奇怪的事，也不是爲了跟進步黨爭功。

呂志伊在「雲南舉義實錄」裏說：「原乙卯之春，中日交涉（日本提出二十一條）事起，予獲日京友人（指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徒）密函，知袁賊有運動帝制之詭謀……」可見孫先生之「倒袁」，早有此心，早在佈置，並非在籌安會發生之次日才合謀大計。呂志伊也不是莽撞之人，在他「決計回滇，企圖進行」之前，曾函達滇省友人羅佩金、李曰垓、趙仲等「代達鄙意於開武將軍唐公繼堯，得其允許。並函致居東（日本）友人李君根源、居君正、胡君漢民，略言緩進急進均不成問題，惟視吾人之實力何如耳……」

唐繼堯有兩重身分，暗中是孫中山先生的信徒（同盟會員），明裏是袁世凱削各省都督「政權」後的開武將軍（雲南行政權握在進步黨人任可澄之手），有人罵唐繼堯爲「風派」，或許與他的這雙重身分有關。讀了呂志伊的「雲南舉義實錄」，可以了解「革命黨」倒袁的艱苦，也可了解唐繼堯的處境困難，更可以明瞭袁世凱實

施了政軍「分立」（將軍署及巡按使署）之後，都督已無「軍政一把抓」的大權，唐繼堯之畔有任可澄（巡按使、管政、進步黨）監視。

我們必須明白袁大總統時代，活動最多，鬥爭最烈的就是國民黨及進步黨。梁啓超是進步黨的老大，仍然承繼保皇黨的遺風，支持袁總統；所以，執政的進步黨（熊希齡內閣是梁啓超促成，梁任司法總長）與國民黨便處於「惡鬥」的局面——這就是老袁爲何同意安排任可澄在唐繼堯之畔的答案。事實上梁啓超也如孫中山一樣，受了袁世凱的烏龍——袁氏志在做皇帝，「事必躬親」，誰也不知袁大頭的悶葫蘆裏在賣什麼藥？國民黨却早有發覺；但在二次革命失敗後，人心渙散，幾乎亡黨。元氣大傷之餘，手無寸鐵的孫中山來收拾殘局，他的方式也改變了——他認爲同志「聽他的話就好」，同志們不必高談闊論，大家也懂不了多少革命之道，「跟着我走準沒有錯」；一副「龍頭大爺」的模樣，確定袁世凱爲革命對頭。梁啓超到籌安會的次日，才與蔡將軍鏢共商大計哩！這祇能說梁氏受老袁的欺騙較深；但是，反過來說，袁大頭過分重視武力，將文人看扁了。所以，蔡鏢到滇，不必看成個人之功，而是老袁的做法，成了「衆怒難犯」，遲早都會有人揭竿而起的。所以，雲南起義的本質，如果必須一提政黨，便是國民黨人與進步黨人在沒有「合作」的口號之下，共同幹下來的「大事」；事實上雲南人在出錢出人，犧牲最大。爲蔡公或爲唐公去爭功，算明智嗎？專門去挖蔡鏢及唐繼堯的瘡疤，不是跡近無聊嗎？（未完待續）